

gustav / April 12, 2009 12:14PM

[站在傅科立場對哈伯馬斯可能的回應](#)

[referebce:

http://140.122.68.128/forum/board/board_content.asp?&board_id=42&title_id=257&CONTENT_NOWPAGE=1]

1、Habermas與Foucault對現代性論述的權力的批判立場是一致的：Habermas想通過立基於「溝通行動能力」轉化為「批判權力的能力」。Foucault則從「系譜學的考掘」批判的追溯權力的起源、語境和其構成的制度。【曾慶豹,1997:10】

(Reminder from Gustav: 在[Power / Blackburn's 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](#)中，Blackburn有介紹到「所有的社會關係都是權力系統 all social relations are systems of power」、「作為基礎的權力並非由個人所行使，而散佈在社會的非個人的面向上，特別展現於監察、規範、教育、馴化人類的各式社會結構的模式中。社會的權力不只限於對人類行為的限制，還包含社會對其成員的自我定義以及生存方式之選擇的宰制能力。)

2、Habermas與Foucault二者皆標榜自己「回到康德」所建立的批判傳統。對現代性所做的批判性重建，Habermas從康德那裡肯定了理性分化的具體成果，即公共領域與法治程序的建制，理性的批判是通過「普遍語用學」進行公共生活辯論邏輯的權力的批判，因此，現代性獲得推進，化解其合法性危機，必須置理性於公共的論述中，論述即是理性和批判的能力和動力，「溝通行動理論」是作為現代性方案的批判機制的論述。反觀Foucault，他則從康德那裡得出「有限性」是現代性的一個標誌的結論，在他承認理性的分化之時，他避免將理性和非理性做專橫的對立，理性不應該、也不可能成為一句「要脅」的口吻，所以不能停留在某一種理性的形式中，因為「理性本身即意味著創造」，不受限於某一種不變的形式，然而也不因此就說成是放棄批判，或批判喪失了基礎。【曾慶豹,1997:118】

3、Habermas致力於「批判的理性」(對權力的控訴)的建構，Foucault卻是一種「理性的批判」(對權力的分析)的展示，之間的區別即是「權力的批判」和「批判的權力」的問題，這不是「詮釋的循環」，而是恰好顯示了兩位思想家對於現代性的理解，權力與批判的分析方法和態度的差別。【曾慶豹,1997:118】

4、Habermas善於替Foucault戴上「後現代主義者」的帽子，採取「先罵先贏」的策略：Habermas未能全面理解Foucault的所有著作，在引證Foucault的著作時，僅依賴一些常識性的觀點，任意扭曲Foucault的文字，有許多批評可以說是無的放矢。筆者以為：Foucault所從事的歷史研究，特別是知識考古學時期的著作，大多採用稗官野史的史料來鋪陳，以表述他個人獨特的歷史視界，所作的工作大多為靜態描述及分析而少(直接地)動態地批判，從未告訴吾人要如何自處(如何做)【除了Foucault晚年語焉未詳的「生存美學」之外】，更未曾妄想要建立體系化的理論。這是Foucault與Habermas的根本差異所在，Habermas對Foucault的批評恐怕多是「以小人之心，度君子之腹」。

參考資料：

曾慶豹 (1997)。權力的批判與批判的權力。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，未出版。

Edited 1 time(s). Last edit at 04/12/2009 05:20PM by gustav.
